本卷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梳理，下卷则集中在宗教改革。作者昆廷·斯金纳为本卷划分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文艺复兴的起源，第二部分讲述意大利地区的文艺复兴，第三部分则关注意大利北方的文艺复兴。据说，本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历史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作者被视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斯金纳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着重关注思想家的写作与其所想要通过行动达成的目的。

作为文艺复兴起源之地的意大利地区，虽然在中世纪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是统一的政治实体，但其拥有着欧洲其他地区所不具有的优势——一种非封建的，城市自治体制。城市共和国兴起于意大利的北部，与当时欧洲的普遍假设——君主继承制是唯一健全的政府形式——格格不入。共和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不可忽视，一种对自由的向往根植在了意大利人的心中。作者并未考察城市自治的起源，但叙述了其衰落。在13世纪末，大部分的城市共和国已经由于内部倾轧而四分五裂，只好放弃共和，逐渐向专制政府过渡。作者认为，因贸易繁荣而拥有愈多财富的平民与独占权力的贵族之间的冲突是矛盾所在。在社会逐渐走向专制的同时，思想家开始为共和的价值而努力。不过除了外在的政治因素，作者亦发现了自由思想在学术领域的“内在理路”。一是修辞学传统，本来是教授草拟官方文书等工具性能力的技巧，逐渐发展为对政治事务的关注与评论，诞生了意在指导行政者的箴规篇一类的书籍。由于古典时代修辞学曾经高度的繁荣，修辞学的学习最终会导向对于古典的模仿和借鉴，由此又引向了文艺复兴的核心——人文主义。作者提到的另一种为自由提供思想资源的学术传统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相当程度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之上，此亦最终呼唤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潮。亚氏的共和理念影响了经院哲学家们，他们也开始倾向一种共和自由的理念。虽然作者没有以归纳的形式写明，但我们可以看到经院哲学和修辞学都引向了人文主义的理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的政治评论家们，对于执政者的道德关注远甚于对于政府运作制度的关注。

第二部分来到了文艺复兴，作者专门用一章叙述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以作为代表。一种一般性的结论仍没有太大的偏差，文艺复兴的主题是对古典价值的恢复，在13世纪末，“古典的过去首次被看作是与现在全然割裂的”。但也要注意到，此时的意大利共和国已经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大幅度向专制政府靠近，意大利又迎来了君主的时代。研究政治的学者将读者从平民转向君主，“君主宝鉴”兴盛。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这些对君主的箴规往往述说了一种对美德的理想，如此才能为国家带来最大的益处。“君主宝鉴”最著名的作品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也赞同君主的行为应当有益、正直，但他对美德提出了最为苛刻的评论。他驳斥了达到荣誉、荣耀和名声目标最可靠的途径是按传统的合乎道德的方式行事。在1454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内，君主政体在意大利几乎所有地方都取得了胜利，不过作者注意到，同时对共和政治思想也作出了最有创造力的贡献。共和自由的思想在一个衰微的时代得到了思想家们的确认而成为了一种“新”的传统。

比起认为北方人文主义是本土自然发展的结果，作者更认同欧洲北部的文艺复兴深受意大利的影响。北方文艺复新的政治理论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15世纪意大利的许多论据的延伸和加强，是恰当的。但是其间也有诸多的不同。北方欧洲首先并没有意大利的共和国政体，他们对于自由的追求相对不太积极。其次，由于在意大利城邦陷入战争与衰退之际，北方相对平和，因此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严厉地批评意大利前辈们关于“不道德行为”（突出的如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看法，伊拉斯谟的名言“天塌下来也要使公道得行”正是马基雅维利的截然反面。然而随着16世纪政治中暴力行为的增加，北方的人文主义者也发现难以维持他们对于以正义理想作为政治生活唯一可能基础的崇高信念。此一时期也诞生了对与“乌托邦”的美好向往，莫尔的《乌托邦》即是对此的严肃讨论。